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十二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

〔美〕林嘉琳 主编
孙 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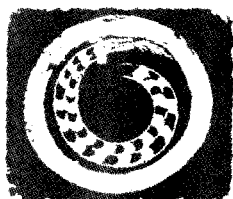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十二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

〔美〕林嘉琳 主编
孙 岩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 (美) 林嘉琳 (Linduff, K. M.), 孙岩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3-018189-1

I. 性… II. ①林…②孙… III. 性别差异—中国—文集
IV. D66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8897 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 责任校对: 郑金红
责任印制: 安春生 / 封面设计: 陈 敬

北京市版权局图字: 01-2006-6126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

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 edited by Kathryn M. Linduff and Yan Su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Copyright © 2004 by AltaMir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12 月 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6 年 12 月 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1/2

印数: 1—1 300 字数: 428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天有 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长 王天有 王邦维 李伯谦

严文明 宋豫秦 赵化成 赵 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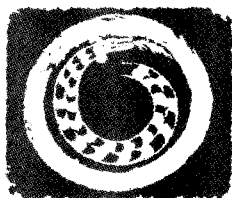
拱玉书 夏正楷 徐天进（常务）

高崇文 郭之虞 程郁缀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No. 12

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Edited by
Katheryn M. Linduff
and Yan Sun



Science Press
Beijing

中译本序

李伯谦

我很高兴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教授 Katheryn M. Linduff (林嘉琳) 和宾夕法尼亚州盖底兹堡学院艺术系助理教授孙岩两位女士同意将她们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中文稿作为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丛书之一在中国出版。正如许倬云教授在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 该书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专著中, 第一本讨论性别问题的研究专集”。因此, 我相信它的出版, 必将进一步引起中国考古学界对性别研究的关注, 促进中国性别考古研究更好的开展。

中国考古学从 1921 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遗址算起, 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在其 8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虽也曾不时出现过一些从性别研究出发探讨历史上两性关系、男女社会角色、地位及演变的文章, 但总体来看, 性别问题受关注的程度不高, 研究范围狭窄, 研究深度不够, 研究手段单一, 成果不够显著。1978 年改革开放, 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 受国外考古同行新思潮新理论方法的启发影响, 性别研究已逐步受到中国考古学者的重视。但时至今日, 在中国考古学界似乎仍没有把性别及其相关问题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一方面, 是因为过去较长时间内, 大家太过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这样即使在研究中涉及了两性问题, 也难以扩大展开; 即使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也只能是作为社会性质研究的“副产品”看待。另一方面, 也许是因为在社会发展历程中, 从父系家长制开始以来, 男性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 无形中对作为主人、掌权者的男性关注过多, 而忽略了对人类的另一半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独立探讨。我接触考古上的两性问题, 还是 1959 年春季到陕西华县考古实习发掘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的时候。当时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是母系还是父系, 是学术界讨论的中心议题。在发掘中, 我们不仅发现有单人葬, 还发现了许多多人合葬墓, 经鉴定, 多人合葬墓中的死者有男性也有女性。有的墓中, 是青年男性、女性合葬; 有的是青年男性、女性和儿童合葬; 有的是老年女性和青年男性、女性合葬; 有的是老年男性和青年男性、女性合葬。这中间有二次葬, 也有一次葬。这些合葬墓中的死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时间成为

同学们争论的焦点。我是仰韶文化母系说的拥护者，记得我们作出的解释是，合葬墓中的青年男女是兄弟姐妹，儿童则是合葬墓中青年男女的外甥或青年女性的儿子，在整个墓地中，没有一座合葬墓中的死者是父子关系。支持我们这种解释的理由是，母系时代实行的是对偶婚，而对偶婚是没有稳定的夫妻生活和家庭的，反映在墓葬上，当然就没有夫妻，以及夫妻与儿子的合葬，而只有兄弟、姐妹与外甥或母子、母女合葬。后来，1975年我带学生到青海乐都柳湾实习，又碰到几座齐家文化的合葬墓，一般男性死者仰身直肢，随葬品放在自己的头前，女性侧身曲折面向男性，没有自己单独的随葬品或只有很少的随葬品置于自己的身旁。根据脑海中固有的从母系至父系的发展规律，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继母系家庭之后出现的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确实存在的实物例证了。记得当时我还组织学生以此为材料，写过论证父权制、贫富分化、阶级压迫怎么产生的文章。3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回忆这些情节，我虽然不认为观点有什么大错，但的确是把性别研究看得太简单了。

时过境迁，现在我们遇到的学术环境最为宽松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我们分析问题、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但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断不再被看作是不容讨论的“金科玉律”，实事求是成为判断一切理论、观点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古代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只要是对促进学术繁荣发展学术进步有帮助的理论、方法，我们都会毫无障碍地予以吸收、借鉴和利用。单就考古学科来说，北京大学自1984年邀请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张光直教授来讲授“考古学专题六讲”以来，迄今已有30多位国外学者到校讲学。召开的以考古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已有10多次之多。从全国范围来看，30多年间，国内考古学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无论是规模、人数、领域、深度可谓与日俱增，一年比一年红火。流行于欧美考古学界的新理论、新方法，几乎是出来没多久，很快就会传到国内来。毋庸讳言，正像中国学者作出的某些论断，在西方学者眼中不被认同一样，也不是所有来自国外的理论、方法和某些论断全为中国学术界接受，全都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是，有不少慢慢销声匿迹了，而有些例如聚落考古、酋邦理论、拉网式调查以及DNA分析、GPS定位等技术手段，或则发挥了极大影响或则已落地生根为中国学者所采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想性别考古，在西方同行们的推动下，在以这本汇集了对中国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性别问题的个案研究范例的启示下，很快也会成为中国考古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那么，这本论文集在哪些方面对我们有所启示呢？我接到孙岩女士发来的稿子，曾断断续续看过两遍，不能说领会得很深，但我体会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在研究两性问题时可以借鉴和应予注意的。

第一，人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既取决于维系人类生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取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而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抑或人类自身的生产，都是由男人和女人合作完成的。因此，作为历史学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学在涉及

性别研究时既要注意对男性的研究，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同时更要注意对女性的研究，因为过去对女性的研究常被忽视。收入这本论文集的 Kathryn M. Linduff（林嘉琳）教授的《安阳殷墓中的女性——王室诸妇、妻子、母亲、军事将领和奴婢》一文，专以安阳殷墟发掘的女性墓为材料，结合甲骨文中的有关记载，集中探讨女性在商代的地位，给研究者做出了示范。

第二，墓葬是研究性别问题很好的材料，但同时也要对居址、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仪仗、装饰品等遗迹、遗物给予足够的注意。这些材料中透露出的有关性别及其关系的信息，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可能是更为直接、更为关键的。十分高兴的是，收入这本论文集的沙瑞·A·鲁罗（Sheri A. Lullo 的）《汉代女神形象》、邱兹惠的《云南青铜文化的骑马纹样》和佩尼·罗德（Penny Rode）的《云南青铜器时代的纺织业和妇女地位》3篇文章均突破了墓葬材料的局限，分别从祠堂、墓葬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及青铜器上的图像纹样出发提出问题、展开讨论，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结论。

第三，墓葬材料对研究性别问题固然很重要，但墓葬毕竟不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实录”，正像孙岩、杨红育在他们的《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男女葬俗及其所反映的社会观念——以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例》一文中引述的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墓葬习俗实际上是由生者来操纵的，它最终反映的是生者的态度和观念，而不一定是死者生前社会角色和地位的真实反映”。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墓葬葬俗时，也要像孙岩、杨红育所作的研究那样，将墓葬习俗中所反映的对男、女两性的态度和观念，通过男女的埋葬方式去重建他们生前的社会关系和角色，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两个不同的步骤进行。

第四，运用墓葬材料研究性别问题既要弄清楚墓主的性别、年龄及其与随葬品的组合、放置位置的关系，又要考虑墓葬的位置、分布及墓葬与墓葬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基础资料的统计并根据统计结果提出假设，确定分析方法，对于能否达到预期结果，做出科学论断就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吴瑞满的《墓葬习俗中的性别角色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大甸子墓地为例》一文，有许多可以借鉴参考之处。他通过以上步骤的研究所得出的大甸子墓地墓葬的“壁龛和填土是放置显示墓主社会地位的随葬品的处所，而葬具是放置显示墓主个人身份随葬品的私密处所”、“不同性别墓主的葬具中的随葬品是显著不同的”、“大甸子墓地，玉饰品既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与性别无关，和它们在中原同一时期的角色不同”、“壁龛中发现的海贝是涂成红色的，葬具中的海贝则不涂红色而是缀在纺织品上，暗示壁龛中的海贝的礼仪功能和葬具中海贝的个人用途”、虽然根据随葬品的多少所确定的“社会地位通常被归类成等级，但是实际上各个等级仍然可以依性别年龄细分为等级”等论断非常新颖，且有充分论据。

第五，墓葬随葬品的数量、组合、质地、特征及放置位置的差异，一般反映的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不同。但从性别角度观察，可能会透露出作为财富的随葬品的来源的多元化等更多的信息。江瑜、黄翠梅、雍颖、吴霄龙、李健菁等在他们的文章中，根据各

自的研究,几乎都指出了男性随葬品来源的比较单一性和女性随葬品来源的复杂性。认为女性的随葬品除有象征地位者,一部分与婚姻有关,可能来自男性配偶的赠与;一部分与自己的职业有关,可能是工作中使用的工具和用具,如纺轮、针、锥之类;一部分则与其所出的家族有关,可能是出嫁时由原家族带来的“陪嫁”。

第六,性别研究也像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既要注意一事、一时、一地的研究,也要注意长时段的考察,因为只有长时段的考察,才会看到变化,看到质变。沙瑞·A·鲁罗的《汉代女神形象》一文,从文字记载和绘画艺术方面系统考察了从周代到汉代一千多年间西王母这位“女神”形象的变化,并与同时期思想史研究相结合,揭示出这种变化正是社会观念、社会思潮变化的反映。逻辑性强,有说服力。

上述研究对在熟习性别研究的学者看来也许会有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对我来说,启发是多方面的,值得认真吸收和借鉴。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论文集中由吉迪(Gideon Shelach)撰写的唯一一篇从学术史和理论层面评论新中国学术界性别研究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及后马克思模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性别研究中之应用》。吉迪在他的大作中公正地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性别问题之探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90年代至今研究成果略呈下降趋势),诸多的学术论文及著作。运用考古学资料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诸如妇女在史前及早期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家庭结构之变化,性别观念及其在宗教活动中之体现等。笔者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些属于‘性别考古学研究范畴’的题目曾经给予过如此充分的重视”。但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性别问题上较长时间内存在着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模式化的错误。应该说,他的意见是中肯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他在评论当前中国学术界研究状况时,除实事求是地指出性别研究较以前出现了弱化趋势外,却不加分析地冠之以“民族主义模式”的帽子,认为“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意将中国历史时间向前延伸”。他举出的例证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个是所谓“将神话和传说当作历史”。我想,对此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我不否认有的研究者,确有将神话和传说误以为是真实历史的情况,但它并非当前中国学术界对远古和上古历史研究的主流。中国先秦古籍确有五帝时代的记述。将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相对应,提出古籍中的某某阶段大体相当于古籍中所说的“五帝时代”并无不妥,而将五帝一一人格化则是我们也不同意的。至于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该研究项目的参与者和负责人之一,我想我有必要告诉对此持批评态度的朋友。“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做出的年表,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绝没有“将中国历史向前延伸”,它得出的夏王朝始年为约公元前2070年。属公元前21世纪前期,最接近传统三个说法(公元前23世纪、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21世纪)中最晚的一说。尽管我和吉迪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但他在文章最后所指出的“搞好考古学研究必须搞好性别考古学研究,因为性别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中

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十分正确的。他提出“不要再忽略与性别相关问题的探讨”的希望是发自肺腑的，我想我们中国学术界理应作出积极的响应。

这本论文集也是献给本书的作者之一雍颖女士的。雍颖在赴美师从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以前，曾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赵朝洪教授研究中国古玉，是一位聪颖、勤奋好学的学生，在匹兹堡大学也深深受林教授的关爱和赏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她学业有成，准备在新的岗位上展现才华的时刻，突被飞来的横祸夺去年轻的生命，这是对她的家人、对她在美国的老师和同学、对国内的老师和同学沉重的打击……雍颖走了，雍颖的文章和雍颖的美好印象将永远留在熟识她的人的脑海里。

2006年9月11日

序

许倬云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当是中国考古学专著之中，第一本讨论性别问题的研究专集。中国考古学，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田野工作的收获极为丰硕，蔚为世界考古学的显学，当时中国学术研究，有预设的理论，考古学更是常为注释理论经典的学科。性别问题，遂不免局限于“母系社会”诸论，未能有暇触及其他课题。海外考古学的研究，同样也承受民族学传统，经常注目于亲属结构、聚落形态、权力性质等题目，于性别问题，鲜少着墨。该书则从性别分工等方向，旁敲直击，尤其重视女性成员在社会、社群、社区中的身份、地位……经常为人忽视的问题，以理清性别差异的社会现象。

该书是从美国匹兹堡大学一系列讨论中引发的研究论文。研究材料包括墓葬、聚落、文物、文献，其研究主题则涵盖财富分配、女性角色、信仰对象……各个不同的观察项目，凡此项目，研究材料取自中国各地的考古成果，时代也由新石器时代延伸到秦汉——时空分布十分广泛。该书是第一次尝试从性别研究考察解释考古资料的著作，即能多姿多彩，已属难能可贵。当然，将来再有以性别研究为主题的著作，就可能特定时间或空间，从事更为深入的探讨了。

性别研究，实与现代社会的尊重女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因缘。传统上，人类社会常因男性掌权而置女性于从属地位，不免忽视了女性在社会分工的特殊地位及功能。二十余年前，有人指出这一不公现象，遂倡导性别研究。然而，矫枉过正，第一阶段的性别研究，常着重在两性平等，以致研究方向也落在两性之“同”。在这一研究园地递入成熟阶段时，遂开始注目于两性之“异”。从女性特有的项目，分析其特点及其所以与男性不同。该书毋宁属于后者，而且颇为兼有两性各具的特点，既不强求其“同”，也不作意褒贬！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本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该书之不同于“女权运动”的意识形态挂帅，自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我曾为该书英文本作序。当时提出了一些有关性别研究出现的缺失。考古报告中，每以随葬的纺轮作为女性使用的工具，并且以纺轮为确定墓主性别的依据。中国传统社会确有男耕女织的分工；但是男性也常用纤维搓制绳索，例如制作鱼网、兽网、缰绳、络头……之属，何尝不用纺轮一类的工具？因此，一见纺轮，即联想到女性的生产专业，似乎有以一概全，未免武断。

又如，考古报告常常将母系、母权、从母居住三项文化现象混为一谈，以为有其中之一，即概括所有三项。然而，民族学资料显示，上述三项可以单独出现，也可能有不同形态的配合。两个族群不断互相通婚，以加强两族的关系，例如，契丹王室耶律氏与后族萧氏累世婚姻，便常有太后执政的母权现象，却并不同时显现从母居住及以母系继承皇位。

一夫多妻现象，常作为男性的强势。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周代贵族社会，实行娣媵婚，以姊妹姑侄同嫁。这是两姓结好，强固联盟关系的政治手段，并不是以女性为弱者的表征。

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之间，应有互补。例如，文献资料中，商代王族为子姓，且文献中从未提过商人可以同姓内通婚。但是，殷商考古发现，有妇好的大墓，从其墓葬规格之高，随葬品之众多而精美，可以看出妇好是王后一级人物。若以殷商命名原则，这位人物是子姓，亦即王室可以娶子姓女子为后了！

凡此诸点，英文序言曾经提过，此处也简述如上，不再赘言。

总之，该书为考古学研究性别问题的开山之作，尤其中文著作，性别考古学更属初次尝试。考古学资料丰富，其中可以开拓的空间，绰绰有余，不必自囿于目前常见的课题。我们可在许多未经耕耘的园地尝试前所未见的阐释。性别研究是一个值得开拓的园地！毕竟，两性人口在总人口中各占一半。近来生物学、人体生理学、心理学与人类学诸学门的研究不约而同，都指陈两性确有生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差异。两性平等，并不相当于两性没有差异。两性合作互补，和而不同，乃是人类社会分工的通例。但是，男性长期的“霸权”主宰了社会发展，以致女性的行为与思维均未有充分的记录。这一缺失遂使人类对于人类群体的了解，只是限于对于一半人类的知识。现代人类已有自觉，应于这一缺失，有所补正。性别研究即是弥补缺陷的工作。考古学必须在这一课题多作努力，已属当务之急。

许倬云序于匹兹堡

2005年3月29日

前言

林嘉琳 (Katheryn M. Linduff) 孙 岩

美国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回顾

性别考古学 (Gender Archaeology) 是近二十年来美国考古学界日渐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它的产生与 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妇女在社会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性别考古学的倡导者特别是女性考古学家认为男性本位主义 (androcentrism) 充斥着考古学界。男性的观点很自然地被认为是正确的、正统的和标准的观点。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考古学领域中对女性考古学家的忽视甚至是偏见和歧视上,也体现在我们对考古学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应用以及材料的解释上。生理决定论 (Biological Essentialism) 是另一个使我们对考古学材料的解释造成偏差的原因。男女生理上的不同被认为是男女社会角色不同和社会关系不平等的根源。因而很多研究不经调查武断地认为女性应当或不应当从事某种社会活动。比如说男性从事狩猎 (Man-the-Hunter), 而女性被完全限制在生产和养育下一代的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生理决定论的例子。这种理论是与特定的观念和文化相关的,而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用当代社会的性别观念去解释远古社会的男女角色和两性关系也是我们在解释考古学材料过程中常常犯的一个错误。这种研究并没有从具体材料出发,忽视了每个文化的独特性。

针对这些问题,美国性别考古学的早期研究主要以寻找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活动和地位为主要目标。研究者试图从考古材料中重建女性在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的作用。1984 年两位女考古学家 Margret Conkey 和 Janet Spector 在美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杂志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发表了题为“考古学和性别研究” (Archaeology and Study of Gender) 一文 (Conkey & Spector, 1984)。这篇文章的发表是性别考古学进入美国正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以后,性别考古学的研究文章逐渐在重要的考古杂志上发表。资助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基金会如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和 Wenner-Gren 基金会也开始出资赞助有关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学术会议和论文的出版。有关性别问题的讨论会也在美国考古学主要协会如美国人类学会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和美国考古学会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的年会上频频出现。这些研究呼吁学者们从性的角度看待考古学材料,对以

往的理论和模式如新考古学 (Processual Archaeology)、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Marxist Archaeology) 和后新考古学 (Post Processual Archaeology) 进行认真地审视, 找到它们忽略性别考古学的原因, 汲取这些理论中有助于性别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以便重建古代社会真正的男女角色、行为和关系。

二十年后的今天, 性别考古学已经从以女性研究为主发展成为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关系的探索。具体来讲, 性别考古学的研究课题涉及到人类起源、社会分工、血亲和家庭结构以及宗教和社会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也在具体材料的研究中相继形成并逐渐得到检验和完善。有些学者们提倡民族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方法在性别考古学中的应用 (如 Conkey & Spector, 1998; Nelson, 2004); 有些学者则提出如何借鉴现有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如 Hill, 1998); 有些学者则注意不同考古学材料在研究古代社会性别问题中的应用 (如 Hill, 1998; Nelson, 2004)。这些材料包括以不同方式和质料表现出的男性和女性的形象诸如发式、服饰以及他们从事活动的描绘, 文献资料、墓葬和人骨材料尤其是 DNA 信息, 器物材料、居住址和房间的布局等。这些学者进一步指出使用多种材料并对其进行交叉检验将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我们认为, 不管从哪一种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区分男女的生理属性 (biological sex) 和社会属性 (gender) 是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前提 (如 Hill, 1998; Nelson, 2004)。生理属性是指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 而社会属性则指男女在文化上的不同, 抑或是基于某种世俗观念和态度对男性或女性的社会角色的认定。我们认为考古学中对男女社会性别的研究必须从古代社会的每个具体文化出发。

当今一些新的课题也进入了性别考古学的研究领域, 比如对考古学材料中未成年两性的研究 (Archaeologies of Childhood)。正如 Sarah M. Nelson 教授所言, 未成年时期不仅是一个生理过程, 也是一个文化阶段, 它与一个社会对成年男女的角色的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Nelson 2004: 138 ~ 149)。另外, 对身体以及对身体的表现 (Bodies in Archaeology)、性行为和个人社会身份 (identities) 等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进入性别考古学的研究领域。

中国考古学有关男女两性问题研究的回顾

古代社会男女两性问题并不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课题。尽管从 20 世纪 50 ~ 80 年代有大量的考古学研究文章致力于男女两性问题的论述, 但这些讨论是对史前社会研究的“副产品”, 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的结果, 并没有真正地从两性研究的角度出发对考古学材料进行系统地分析。墓葬材料经常是这些研究的唯一证据。比如, 男女成人合葬墓以及生产工具在男女墓中的分布经常用于讨论史前社会的婚姻状况、社会分工、血缘关系以及男女社会地位。这些材料也经常用于印证母系、父系或父权社会的存在。在这种研究方法下, 史前社会的男女关系也随着社

会性质的确定而确立。也就是说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被认为是史前社会发展的必然和普遍规律。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两性问题在夏商周考古学中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但一些历史学家却在两性问题的研究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例如,许倬云先生运用《周礼》和民族学的材料相互印证,提出女性是农业的发明者。他的观点直接挑战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观念(Hsu, 1954)。胡厚宣先生则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系统地讨论了商代社会晚期婚姻、血缘、家族和两性关系(胡厚宣, 1970: 1~35)。8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应用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质疑和挑战。这一时期尤其是近十年的考古学出版物中逐渐出现了多样的理论和方法,诸如聚落研究、环境分析、金相测定等。尽管如此,两性问题始终没有成为考古学研究关注的课题。个别的讨论只在出版物中零星见到。如陈铁梅和王仁湘分别运用统计的方法探讨新石器时代墓葬材料中男女的性别比例。他们认为杀害女婴是造成这一时期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原因(陈铁梅, 1990; 王仁湘, 1996: 68~82)。《阴柔与阳刚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是最近研究两性问题的有代表的出版物(闵家胤, 1995)。书中一半的文章讨论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两性的社会关系问题。其中杜金鹏先生关于夏商时期两性关系的研究试图从考古、文献、甲骨文和神话传说等各方面的资料重建商代社会不同阶层男女的角色和婚姻关系(杜金鹏, 1995: 93~133)。

在美国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学者中, Nelson (Sarah M. Nelson) 和 Linduff (Katheryn M. Linduff) 两位教授是两性研究的倡导者。Nelson 教授通过玉器在红山文化墓葬中的分布和使用的研究认为,政治权力和有关两性的意识形态是相互依赖的。Linduff 教授对安阳女性墓葬和甲骨文的对比研究表明了葬俗中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是由她们的文化背景和家族地位所决定的。Raphals 和 Hinsch 两位学者也从文献出发,对秦汉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这些工作为将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这部书希望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活跃中国考古学界的两性研究。

本书中每篇论文的简介

这部书共收集了 12 篇论文,其中一些文章的酝酿是在 2000 年秋匹兹堡大学中国考古学和性别研究的研究生课上开始的。一些论文在 2001 年春华盛顿举办的亚洲年会上宣读。全书共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两性问题的各个方面,涉及了从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至西北甘青地区、长城地带以及西南的云南等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论文的 authors 充分利用现有的考古学材料致力于在理论和方法上寻求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之路。这些作者深知墓葬材料的局限性,他们尽可能地使用多方面的证据与墓葬资料相互印证。统计学的方法也在一些研究中帮助作者寻找现象和规律。

尽管论文中运用的方法和性别研究的社会学理论不同,作者们都以现有的发掘资料

为起点进行研究。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发掘资料的局限性以及史书中“正统”观点的偏见性。在很多情况下墓葬中墓主的性别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一些作者如邱兹惠、黄翠梅、李健菁、佩尼·罗德和雍颖通过仔细地分析提出随葬品在一定的考古学环境下可以用来鉴定墓主的性别；一些作者如孙岩和杨红育、吴瑞满、吴霄龙则利用已经鉴定过性别的墓葬和墓地为研究对象。有些作者还提出墓葬的分布和大小在一些情况下可作为鉴定墓主性别的证据。

鲁罗、佩尼和邱兹惠的文章试图从器物上的装饰、壁画或雕塑出发讨论男女的社会角色。江瑜和雍颖的研究表明青铜礼器上的铭文也是鉴定墓主性别、男女关系以及与政治权力关系的重要依据。吴霄龙和吴瑞满的研究则认为男性和女性取得社会地位的方式不同。其他几篇论文或表现女性在墓葬中比男性奢华的葬俗或表现两者的不同。

吉迪的文章着眼于探讨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两性问题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状况以及与中国考古学理论在不同时期的关系。他认为有关两性问题的研究在 60~80 年代的史前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尽管这些研究并非以讨论两性关系为目的，却在理论和方法上丰富了史前考古学中不同课题的探讨。而从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开始，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理论的丰富，性别问题却被考古学家们少有涉及。吉迪呼吁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建立起讨论性别问题的有效研究方法和理论。

孙岩和杨红育讨论的重点是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墓葬习俗中所反映出的对男女两性的态度和社会观念。作者试图从一个区域内两个相继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入手，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上探讨葬俗中与男女两性相关的三个问题：即随葬工具在男女两性墓中的分布、成年男女合葬墓和男女的艺术形象。他们的研究不仅表明了葬俗对男女的态度在区域上的多样性和在时间上的差别，也在方法上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墓葬习俗与男女生前社会地位的关系。

吴瑞满的文章从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材料出发，分析随葬品的数量、类型和安放位置在墓主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她的讨论试图重建这些差异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男女地位和权力关系。她认为大甸子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其丈夫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女性的个人财富则更有可能来自她的母族或者夫家。

宝鸡地区西周时期彊国男女贵族的角色和地位是江瑜研究的重点。他从青铜铭文和墓葬两方面的材料发现彊国贵族中一夫多妻的现象，彊伯的妻子们是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的。他认为贵族妇女的地位是相对的。正妻的地位往往由于她们母家的政治地位和权势较其他女性高贵。

玉器在两周时期晋国的重要性是这本论文集两篇文章的讨论重点。黄翠梅以考古资料丰富又曾进行墓主性别判定的天马、曲村和上马三处晋国墓地为例，对西周至春秋时期男女贵族和平民墓葬随葬玉器的种类与数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和性别在用玉现象上的差异。

雍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公元前 10 世纪至前 8 世纪的晋侯夫妇合葬墓。文章从墓葬的空间位置、墓室的结构、随葬品以及殉葬的车马坑等墓葬材料分析,认为晋侯夫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一时期有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周王室的礼制改革以及晋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考虑息息相关。

居住在中原以外长城地带的游牧或半游牧的部族是吴霄龙和李健菁论文的研究重点。殉牲是这些部族葬俗的主要特点。吴霄龙对毛庆沟墓地单人墓中的随葬品按功能进行分类,并讨论了它们在社会经济方面对不同年龄男女墓主的重要性。他认为毛庆沟社会男女获取财富的方式不同。男性可能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他们的财富,而女性的财富则有可能来自她们的母家,这与女性在氏族之间联姻中的角色有重要的关系。李健菁的文章则以黑龙江省泰来县的平洋墓地为研究对象。她认为族属与不同的文化传统是影响墓葬在该墓地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而从男女墓中随葬品的分布状况看,男女的社会分工在平洋墓地并不是固定的。

西王母是沙瑞·A·鲁罗文章讨论的主要课题。以往对西王母形象的研究大多依据文献资料,而忽视了这一女神形象在汉代从文献到艺术表现上的转变。她指出西王母的人性化以及西王母与东王公的配对与汉代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以及加强男人统治的稳定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邱兹惠和佩尼·罗德的研究是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引人注目的云南东部的青铜文化。邱兹惠以石寨山文化青铜艺术中的马具和骑马的形象为研究材料,她发现马术和畜牧业是滇人男性文化的主要特点。滇人的男性贵族以通晓骑术和控制青铜铸造来建立和维护其特殊的社会地位。Rode 的研究强调女性在公元前 1 世纪滇文化纺织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她认为布匹不仅是滇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也是以特权女性为中心的宗教仪式的核心。纺织业是滇文化中极受重视的行业,少数女性通过控制纺织业获取财富和权利。

这本书的英文文稿是美国 AltaMira 出版社《性别与考古学》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已于 2004 年夏出版。中文版的出版承蒙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李伯谦教授的鼓励和支持,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严文明教授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感谢两位教授为性别研究这一课题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推广所做的努力。我们还特别感谢“蒋经国基金会”为部分出版费用提供的支持。我们更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国内外更多的学者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未来的工作不仅需要我们对中国现有的丰富的考古学材料从性别角度去重新审视,更需要我们逐渐形成中国性别考古学的研究课题和方法,以性别研究为起点的田野工作也不妨是我们今后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方向。